

武汉国民政府史

袁继成 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荆楚文库

武汉国民政府史

袁继成 编著

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北伐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洪流里建立起来的，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政权，它既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不同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领导的，无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参加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地主阶级联合的，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新政权。

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开始，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叛变止，作为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只存在七个月的时间。而在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订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后，武汉政府还经历了一段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合流过程。九月二十日，宁沪汉三方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从形式上也最后终结了，因而武汉政府从成立到完全终结约九个月的时间。

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在这急剧变化的日子里，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新旧军阀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各方面的矛盾，都充分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时期内，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工农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反革命势力的狡诈和残酷、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及其右翼势力的叛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各方面政治势力的组合和分解、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

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此前任何一次革命斗争所不可比拟的。

事物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都会呈现出阶段性来，武汉国民政府也经历了胜利发展、局部失败、动摇反动和解体终结的曲折途程。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对武汉政府的建立、发展和终结，以及它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做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第一章是对武汉政府的建立和这一时期背景的概述。第二章主要说明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得到了猛烈的发展以及工农运动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第三和第四两章主要是对武汉政府的外交关系和内政设施，做一些简述和具体的分析。第五、六、七三章阐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政府虽然不断地进行着斗争，但武汉政府内部的反动倾向则日益发展，并终于由动摇而步入了反动的途程。第八章主要说明在紧急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斗争情况，以及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危害。第九章主要说明在革命遭到失败的形势下，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所作的艰苦顽强的斗争，一方面则是宁沪汉合流的过程。

总之，我们试图按照历史事实的发展，从纵的方面阐述武汉政府经历的历史过程，同时又从横的方面对作为带有新型色彩的这一政权的一系列重大措施，进行较集中的评述。很明显，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虽然我们曾尽可能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对这一历史时期中的重要问题及其过程较全面地做些阐明，但是，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和掌握资料不够，这只能是个初步的尝试，缺点和错误之处是难免的，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国民政府迁移武汉·····	1
第一节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1
第二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18
第三节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	33
第四节 北伐战争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48
第二章 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67
第一节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	67
第二节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的成立·····	88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高涨·····	100
第四节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15
第三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124
第一节 国民政府迁汉前后的对外关系·····	124
第二节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39
第三节 南京事件与“四三”事件·····	154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建设·····	172
第一节 经济设施·····	172
第二节 财政措施·····	185
第三节 法制建设·····	195
第四节 教育事业·····	209
第五节 新闻事业·····	224
第五章 维护党权运动·····	239
第一节 反对蒋介石改都南昌的斗争·····	239
第二节 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运动·····	250

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262
第六章 南京、北京反动政权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立	279
第一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279
第二节 重庆、北京、广东的大屠杀	297
第三节 宁汉对立	308
第四节 武汉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319
第五节 第二次北伐	332
第七章 武汉国民党的动摇和反动	345
第一节 夏斗寅叛变	345
第二节 马日事变	358
第三节 武汉政府压制工农运动	372
第四节 朱培德“礼送”共产党	378
第五节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388
第八章 武汉国民政府后期的中国共产党	403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03
第二节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五月决议”和 “紧急指示”	415
第三节 武汉政府后期的农民运动	426
第四节 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445
第五节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危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改组	458
第九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终结	474
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474
第二节 宁沪汉三方合流	494
结束语	501
编后记	508

第一章 国民政府迁移武汉

第一节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一、国共合作建立后的革命形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反复思考、论争和切磋，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底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海外侨胞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出席了开幕式。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祖涵（伯渠）、李立三、李维汉、宣中华、廖乾五、王尽美、于树德等二十三人参加了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主持大会的全部活动，并由他指定胡汉民、林森、谢持、李大钊、汪精卫（兆铭）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孙中山在演说里援引古人“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话，强调国民党要以苏俄为榜样，重新做起。^①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黄季陆、江伟藩等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②，并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这是国民党内反对联共政策分子的公开挑战。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鼓噪，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在大会上当即发表声明说：“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他恳切希望大会的全体代表，应开诚布公，以诚相见，光明正大，共谋革命之大业。“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①李大钊的声明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廖仲恺也当即发言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②。不少代表斥责方瑞麟的提案。当日大会的执行主席胡汉民，怕反对跨党案被通过，无法向孙中山交代，也表示不赞成方瑞麟的提案。结果这个企图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案被否决。大会议决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全票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在孙中山主持下，由鲍罗廷、瞿秋白、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起草和定稿的文件，被大会一致通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宣言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侵夺的“半殖民地”，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主子共同压榨中国人民。宣言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反帝反封建政纲，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内容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宣言指出：“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因而确定“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③所以说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关于民权主义，宣言规定：“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④实际上就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要求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反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的民生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③④ 《中国国民党宣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

主义，即：“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①大会后，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孙中山对于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是很重视的，把它作为“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②来看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宣言的划时代意义，指出：“只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③虽然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民主革命政纲基本相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两者代表着不同阶级，在宇宙观和革命彻底性等方面不同，因而在统一战线内部又存在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对于日后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大会在选举中央执监委员时，孙中山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连本总理共为二十五人，赞成这二十五人之人数者请举手。”^④大会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为：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傖、于树德。接着又通过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十七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一月三十一日，由

① 《中国国民党宣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4 年版。

②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1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83 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16 号。

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常务委员，主管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①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②随后，全国许多省市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国民党党部。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李大钊、于树德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先后是国民党武汉执行部的负责人。这样，国民党就发展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既是首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又是大革命高潮的起点。它揭开了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史的新篇章，大大加速了革命的步伐，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迅速向前发展。

第一，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立。

孙中山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的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孙中山正式委任蒋介石为校长，九日委任廖仲恺为党代表。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大会演说，要求学员向先烈学习，以造成理想上的革命军。他说：“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③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成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一批批的革命精英在这里迅速成长。由于学校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不仅学生可以购阅

^① 参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

^② 参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③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8页。

马列主义书刊，政治部还随时购置之。^①所以学生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的提高。学校还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不仅派船送来“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②，还派来顾问团帮助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这样，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提高都很快，成为统一广东和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力量。但校内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却非常激烈，右派组织给军校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

为了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才，切实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在彭湃等共产党人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定。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先后共办了六届。历届讲习所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分别担任历届的所长。绝大多数教员是共产党员，学员也多是由各地共产党组织选派的进步青年，毕业后实际上也是由共产党分配工作。近八百名毕业生分配到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其中很多人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③这不但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日后的中国革命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一九二四年七月，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反帝罢工，坚持一个多月而取得了胜利，打破了“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近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向大会派出代表，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新阵容。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从上海开始而席卷

① 《黄埔潮》第7期，1925年10月31日。

② 王柏龄：《创办黄埔之回忆》，载《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

③ 《广州农讲所学员的作用》，见《新琼崖评论》第14期；《犁头周报》第19、20期合刊；《中国青年》第99期；《中国国民党广西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日报》等。

全国，“大大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并准备了全国的大革命”^①。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了“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省港罢工工人，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工人阶级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省蓬勃展开。一九二四年八月，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彭湃、周其鉴等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全国第一个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②，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一九二四年冬，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回到广西后，在东兰县开展农民运动，在右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秘密农会，亲自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我党在农村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取得许多成绩，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青年、妇女、市民等各项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为大革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

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惊慌，他们竭力向广东革命势力进攻。因而，消灭广东各地的反动武装，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为推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条件。

首先是镇压商团的叛乱。广州商团是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一支反动武装。其头子是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游行时，商团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③，打死打伤数十人，并贴出“请孙文下野”，“请陈炯明回省主政”等反动标语，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③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府。在广州处于危急的时刻，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帮助正在韶关准备北伐的孙中山克服了犹豫不决的态度。促使孙中山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成立了以他为会长的镇压商团叛乱委员会，立即调他的警卫团及湘、粤军一部回广州，协同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了初步稳定。

接着是两次东征的胜利。当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为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时候，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勾结林虎、方本仁等部，分三路进攻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军由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滇军、桂军等部组成，主力则是黄埔学生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是其中的骨干。周恩来亲自领导黄埔学生军中的政治工作并参与作战指挥。正当东征军进军之际，传来了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的消息。广大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等地农民的积极援助下，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但这时，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却趁革命军主力远在东江之机，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已经控制了广州的要害部门。六月，东征军自东江回师省城弭平了刘杨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十月又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收复了东江。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的统一和巩固。

二、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决议案》，但因两广没有统一，未能实行。东征胜利和广州叛乱的平定，不但使广东基本上统一，广西政府也于此时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而成立国民政府的条件大致成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①。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是首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

^① 参见《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04页。

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合议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十六名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他们是：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闿、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①，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由于实行合议制，虽然政府设主席一人，可是重要国务皆由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决定执行。这个原则较过去大元帅府时实行的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做法，显然是个重大的进步。

七月三日，广东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新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也进行了改组。设立军事、民政、财政、建设、商务、教育、农工七厅，分别由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担任各厅的厅长，并由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为委员长。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即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军事方面。国民政府成立前，各派军队林立，独自设立防区，形同割据。国民政府成立后，取消地方军的名称，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七月三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八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八月二十六日，军事委员会议决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是：黄埔学生军加上一部分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程潜所部的攻鄂军此时尚未成为一军，第二次东征后，改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广西方面的桂军，在两广政治统一的工作全部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 1930 年印行，第 624 页。

完成时，才改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北伐出师前夕，把唐生智（孟潇）的部队改编为第八军，由唐生智任军长。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各军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设立了政治部，因而各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制度，对于中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行政方面。国民政府成立时，广西当局还只是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研究和提出两广统一的方案。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两广统一案^①，其主要内容是：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全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六月一日，广西依照此统一案，始正式组织省政府，并由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至此，两广的政治统一才告完成。国民政府在抓紧两广统一的同时，对于广东省在行政管理上的统一也很重视。原来广东地方官吏，各自为政，大元帅府的权力难在广州以外实行。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东省政府把九十四个县划为东江、南路、广州、西江、北江、及海南六个行政区，委任周恩来、甘乃光、宋子文、古应芬分别担任东江、南路、广州、西江的行政委员，为该区之最高行政长官。周恩来治理东江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于他治理有方，成绩卓著，深受岭南人民的欢迎。^②

第三，财政方面。原来是各军自行收税派捐，强大的滇军掌握了广州的财源，如铁路、赌场、妓院、烟酒税等，而粤系军阀对此不能善罢甘休，矛盾非常尖锐。财政部长廖仲恺提出统一财政的文件，规定各种税款的征收和全部军事费用的支出都交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所有负责人员都要大公无私，决不克扣分文归己。由于廖仲恺态度坚决，措施得当，自统一财政后，收支状况有很大改善。一九二三年，广东省平均月

^① 蔡元培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商务印书馆，第99页。

^② 《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载《政治周报》第9期。

收入为八十五万八千元，一九二四年降为六十六万五千元，国民政府成立后则迅速增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份收入达四百万元。

国民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在中国近代政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不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对于日后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仍然是初步的。在广东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反动政治势力及其经济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由于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人不参加国民政府“做官”的错误方针，共产党员就没能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主要负责工作，使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国民政府里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统一战线中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三、北伐前夕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使国民党内的左、中、右各派的分野日益明显。孙中山逝世后，立即呈现出分裂局面。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联合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他们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妄图使正在兴起的国共合作的事业，沿着大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道路发展下去，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是继续维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要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革命沿着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有利于工农劳动人民的道路前进。这两者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到了北伐的前夕，斗争更趋激烈。斗争的实质就是由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重大事件上。

第一，反对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的右派分子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政治委员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鲍罗廷》等一系列反动的决议。^①宣布开除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瞿

^① 参见邹鲁《西山会议》。

秋白、于树德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①。因会议在北京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又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宣布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及其宣言和决议，分裂国民党。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共产党人和广大国民党员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还在西山会议进行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是非法的。接着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又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指出他们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党籍是分裂国民党的行为。会议决定尽快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各级党部、海外各总支部、国民革命军的一些特别党部，都纷纷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和报导，猛烈抨击西山会议派反共、反人民的言行。驳斥他们召开非法会议的种种借口，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西山会议派反对广州国民政府的阴谋。这些斗争，为在组织上处理西山会议派，做好了舆论准备。

第二，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斗争。虽然国民党中央决定及时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出走以及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会期被一再拖延下去。汪精卫对先期到广州的吴玉章说：“恐大会开不成。”吴玉章等共产党人认为，如不及时召开大会，“国民党有解体之虞”^②。遂由谭平山提议，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任命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加紧会议的筹备工作。事实上，这些工作大都是靠共产党员做的。据吴玉章回忆：“那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同志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同志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我经常往来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同志。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③ 主要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

① 参见《清党实录》。

② 《吴玉章自传》，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③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31 页。